

## 对德国穆斯林移民社会融入的再思考 ——以宗教认同与公民身份互动为视角

刘 骞

**内容提要** 近年来,德国的穆斯林移民社会融入问题备受关注,其中包含“传统社会纽带”宗教认同与“现代国家基石”公民身份之间的关系。穆斯林移民要融入德国,意味着穆斯林移民的宗教认同体系要能够为德国的“政治-法律”系统所接纳,同时还需要与德国的社会各界实现良性的互动,在“文化-心理”意义上建立起归属感。围绕行为角色的“主体与客体”、行为态度的“积极与消极”,穆斯林移民在德国的社会融入有四种情形:“完全意愿合力式融入”“主体半意愿主动式融入”“客体半意愿推动式融入”和“意愿隔离式融入”。在社会融入过程中,穆斯林移民与德方遵循着两种不同的行动逻辑,前者表现出宗教世俗化的趋向性特征,后者的社会接纳行为更多是对“自我-他者”“外部性内化-内部性外化”的互动实践及其实践经验的依靠。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政治 穆斯林移民 德国 社会融入 宗教认同与公民身份

---

\* 刘骞: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邮编:200092)

\*\* 本文得到“同济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课题组成员封畅对本文在穆斯林移民社会融入的三种情形论述方面提供了观点支持和建议,特此致谢。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审读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中的疏漏和不足之处概由笔者负责。

全球化正在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互动变得愈发频繁和密切,人口的空间迁移也逐渐成为一种惯常的社会现象,而当这种空间的变化打破国家边界,并引发出移民社会适应和国家治理问题的时候,关于跨国移民及其治理的研究也开始逐渐成为国际政治学的重要议题。从现实上看,近年来,恐怖袭击在欧洲本土的频发已经引起欧洲各国对欧洲安全形势的巨大忧虑。<sup>①</sup>而且,“数起发生在欧洲和西方的恐怖主义袭击也被查明与穆斯林移民中的极端分子有关联”。<sup>②</sup>这使得穆斯林移民开始被视为恐怖主义分子的一个“来源”,甚至一些欧洲国家还对穆斯林移民采取安全化的应对。<sup>③</sup>在此背景下,关于穆斯林移民跨国社会融入及其内在逻辑的讨论也开始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与此相应,作为欧洲最主要的国家和最大的穆斯林移民涌入国之一,德国的穆斯林移民社会融入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也形成了历史分析、社会分析和政治分析为代表的三种研究路径。

采用历史分析为主要路径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德国,穆斯林移民融入社会是一个历史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穆斯林选择移民德国的原因各有不同,<sup>④</sup>这直接导致了德国对穆斯林移民在态度方面的差别。<sup>⑤</sup>同时,在不同历史时期,德国各方关于融入程度标准的不同认知也直接导致了穆斯林移民在德国的社会融入的不同特点。<sup>⑥</sup>

采用社会分析路径的研究成果主要从移民的社会融入与社会适应性角度进行分析,强调穆斯林移民的宗教慰藉、社会资源和社群组织是关乎其社会融入的三个重要因素。<sup>⑦</sup>有学者从对社会融入不同类型的理解出发,强调移民社

① 《欧洲安全形势不容乐观近一年主要恐袭事件一览》,http://www.chinanews.com/gj/2017/03-23/8180987.shtml,2017-03-23。

② 陈昕彤:《穆斯林难民融入欧洲的问题与挑战》,《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6期,第83页。

③ Jocelyne Cesari, “Securitization of Islam in Europe,” in Jocelyn Cesari, ed., *Muslims in the West after 9/11: Religion, Politics, and Law*,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④ 宋全成:《简论德国移民的历史进程》,《文史哲》2005年第3期;另参见 Krim Yildiz, *The Kurds in Turkey: EU Accession and Human Rights*,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⑤ James P. Lynch and Rita J. Simon, *Immigration the World Over: Statute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3. 另参见〔德〕沃尔夫冈·鲁茨欧:《德国政府与政治》(第7版),熊炜、王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⑥ 胡雨:《穆斯林移民在德国及其社会融入》,《德国研究》2013年第3期,第69—80页。

⑦ Nadia Jeldtoft, “Lived Islam—Religious Identity with ‘Non-organized’ Muslim Minoritie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34, Iss. 7, July 2011; Ahmet Yukleyen, *Localizing Islam in Europe: Turkish Islamic Communities in Germany and the Netherlands*,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12.

会融入具有三种不同情形(同化式融入、融合式融入与隔离式融入),而德国的穆斯林移民更多具有隔离式融入的特点。<sup>①</sup>

政治分析路径的支持者更多强调穆斯林移民社会融入的政治学意义,形成了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两种认识。主观主义者认为德国穆斯林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是政治主体间互动建构的,其实质是建立在价值诉求和利益需要基础上各方政治势力博弈的产物。<sup>②</sup>客观主义者则指出穆斯林移民在德国的社会融入可能带来相对消极的公共性问题和政治性影响,甚至倒逼着德国的移民政策在矛盾和妥协之间摇摆,<sup>③</sup>强调穆斯林移民因语言问题和文化差异而处于边缘化境地的情形使之难以建立新的身份认同,这只能使其逐渐走向德国主流社会和对立面的对立面,<sup>④</sup>而德国大多数民众与穆斯林移民之间相互悲观的彼此认知正在成为穆斯林移民融入德国社会的重要阻碍。<sup>⑤</sup>

这三种分析路径的研究成果选择不同研究视角,遵循不同的研究思路,并探索着不同的研究问题,提出了很多的真知灼见,但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一方面,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来看,三种研究路径都意识到穆斯林移民的宗教信仰是其区别于一般移民的重要因素,而且,宗教因素在穆斯林移民的社会融入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但是,这三种研究路径更多将穆斯林移民的社会融入单一的视为历史发展、社会进程和政治过程的“伴生物”,或者将宗教因素纳入历史情境、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的范畴进行分析,这就忽视了作为研究对象的穆斯林移民所具有的宗教特殊性。

另一方面,从研究对象的影响因素来看,三种分析的路径都意识到,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跨国的社会交往中,穆斯林移民将拥有着更为多元的身份,宗教因素对穆斯林移民的影响正在式微,相比,客居国的社会与政治身份为穆

① Steffen Angenendt, “Muslims, Integration, and Security in Europe,” in Steffen Angenendt, et al., *Muslim Integration: Challenging Conventional Wisdom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 C.: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7.

② Jocelyne Cesari, “Securitization of Islam in Europe,” pp. 9-25.

③ 伍慧萍:《“融入”的现实困境与文化冲突:德国的移民政策和外来移民运动》,《学术前沿》2014年第4期;另参见黄叶青、彭华民:《迁移与排斥:德国移民政策模式探析》,《欧洲研究》2010年第5期。

④ 陈志强、赵梓晴:《德国移民问题的形成与治理》,《上海商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第61页。

⑤ Ruud Koopmans, “Fundamentalism and Out-group Hostility: Muslim Immigrants and Christian Natives in Western Europe,” *WZB Discussion Paper*, No.SP VI, 2014-101, March 2014; Soeren Kern, “The Islamization of Germany in 2016,” <https://www.gatestoneinstitute.org/9700/germany-islamization>, 2017-01-02.

穆斯林移民提供着更具现实性的需要,进而影响着其跨国的社会融入。但是,宗教对穆斯林移民的影响弱化也只是相对而言的,而且宗教身份对信徒的意义未必可以用世俗的需求来衡量,此外,任何因素对宗教身份的冲击都不是单向度的,宗教因素也可能对其他因素构成反向影响。

本文着重探讨宗教因素在穆斯林移民跨国社会融入过程中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对作为融入主体(穆斯林移民)所关注的宗教认同与作为融入客体(客居国)所关注的公民身份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 一、穆斯林移民的宗教性内涵与意义

一直以来,在移民跨国社会融入的研究中,“社会融入”更多被界定为是一个“行为体以集体或者个体的形式被纳入进社会系统之内的过程”。<sup>①</sup>但是,对这一过程内涵的理解却形成了系统论与互动论两种认识,前者把过程的客体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并将社会看成是一个整体系统,由多个子系统组成,社会融入被界定为是一种系统的匹配,强调融入主体的“被纳入”已经与社会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形成了有序的关系;<sup>②</sup>后者从过程的主体出发,认为社会融入是社会行为体之间互动的结果,社会融入的实现更多取决于融入主体与其他行为体之间能否实现良性的互动。<sup>③</sup>

这两种认识围绕社会融入过程的两个向度即“融入方”与“接纳方”展开,却没有建立起对两者之间互动关系的讨论。如果社会系统的有序匹配与行为体间的良性互动都属于社会融入的范畴,那么,这两种关于社会融入的内涵理解应属于社会融入不同向度的内容,还是社会融入不同程度的内容,或者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特定的关系呢?与此相对应,从穆斯林移民在德国的社会融入来看,社会融入能否顺利实现不仅与穆斯林移民的意愿强弱、德国政府与社会的接纳情况相关,更取决于双方意识上的认知,以及行动上的互动。所以,无论是形成“有序的匹配”还是“良性的互动”,这种认知与行动都会影响着

① 郑朗、伍慧萍:《新世纪德国移民融入政策及其理念分析》,《德国研究》2010年第4期,第13页。

② 周志家:《社会系统与社会和谐》,载《“福建省社会学2006年会”论文集》,福建:厦门大学,2006年5月1日,第111页。

③ 陈成文、孙嘉悦:《社会融入:一个概念的社会学意义》,《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6期,第69页。

穆斯林移民在德国的社会融入。

从另一个角度上看,与一般移民不同,宗教性是穆斯林移民最显著的一个差异化特征。因为从族群分界的角度上看,尽管体制和文化的特征常常被用于作为“边界的符号”以寻找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但社会群体的边界不一定指的是其物化的客观性边界,还应考虑其社会的主观性边界,即“族群并非是在共同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群体,而是在文化差异基础上的群体的建构过程”。<sup>①</sup>穆斯林的宗教性就承载着这样的意义,因为“伊斯兰宗教理论是指导穆斯林的主要信条,伊斯兰的文化理论皆由伊斯兰宗教理论发展及延伸而来,完全遵循着伊斯兰教的精髓”,“伊斯兰宗教与其社会生活形影不离,两者关系密不可分”。<sup>②</sup>所以,从宗教视角上理解穆斯林移民的社会融入具有重要意义。

早期的宗教学者在探讨宗教及其社会作用的时候就曾注意到信徒跨界融入这一问题,并尝试从心理学和社会学角度进行解释,尽管两种视角在学理的研究起点上存在区别,即前者将宗教视为个体的承载对象,而后者却强调把人际关系作为源泉,将宗教视为社会中相互作用和群体生活的产物,<sup>③</sup>但在后续的论争中,两种范式不断趋同,强调宗教是各种力量(生理的、求知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结合的产物,这也造就了宗教具有影响各种个人或社会结果的功能。但是,宗教功能论强调宗教因其具有多元的功能而影响信徒跨界融入的观点更像是一种目的论,其论证逻辑并非由因到果,而是根据结果设定原因,而且,“宗教功能论”关于宗教具有正反功能,并进而产生正反社会影响的观点似乎显得过于模糊,因为任何事物的正反两面功能效用都是同时存在的。

在这个意义上,新的宗教功能论者从宗教规范塑造社会秩序的角度出发,尝试通过引入“社会整合”的概念,对“宗教在什么情况下表现出影响信徒跨界社会融入的功能”进行分析,并提出宗教弱化社会整合功能的六大变项:(1)存在多种宗教的社会;(2)当社会成员“已确定的期望”受到阻挠,而运用宗教作为表达他们分离意识的工具或武器的时候;(3)当信徒的社会身份认同削弱其

① [挪威]弗雷德里克·巴斯主编:《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代译序”,李丽琴译,马成俊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1页。

② 刘月琴:《伊斯兰文化与社会现实问题的考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2页。

③ Paul Radin, *Primitive Religion Its Nature & Origin (copyright 1937)*, Kansas: Omega Publications, 2006, pp. 6-9; Emile Durkheim,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copyright 1965)*, Karen E. Fields Translat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5, pp. 419-423.

宗教认同的时候；(4) 一个社会转变为另一个社会而产生革命性巨变的时候；(5) 社会出现明显的社会等级，且处于较高位置的阶级意图运用宗教化解与较低阶级之间等级压迫现象的时候；(6) 当外部压力使一个社会分化的时候。<sup>①</sup>

与此同时，站在新功能论者对立面的冲突社会学者则从社会整合的反面提出四个宗教因素导致社会分裂的情形，对“宗教在什么情况下会导致信徒在跨界社会融入过程中引发冲突”进行回答。第一种情形认为，宗教破坏了社会整合是由于宗教冲突的存在，而宗教冲突往往与社会变化有深刻的联系；第二、三种情形认为，冲突源于人类各种复杂的忠诚表现及由此产生的排他性，所以，社会身份会对信徒的宗教身份及其认同体系产生排斥效应，同样，信徒的宗教身份及其认同体系也会排斥其社会身份；第四种情形从冲突的本质出发，强调宗教可以成为分裂分子的工具而引发冲突。<sup>②</sup>

基于这样的认识，从穆斯林移民在德国社会融入的现实情况来看，“社会功能模式”六个变项中的第二、四、五、六项所表述的可能性可以排除，而“社会冲突模式”四种情形中的第一、四种情形所阐述的可能性也不适用于德国的情况。相关的调查表明，目前，德国穆斯林移民明确的社会期望就是能成为德国公民，他们还为此成立了一些伊斯兰教组织，并尝试通过组织动员影响政府决策的方式来争取其社会期望的实现。<sup>③</sup> 而德国政府也意识到，穆斯林移民融入问题的处理一方面可能会在穆斯林群体中诱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导致反伊斯兰的极端情绪在德国社会蔓延。所以，德国政府与社会各界在穆斯林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上坚持开放又审慎的态度。<sup>④</sup> 2006年，时任内政部长的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创立了一个双方对话的平台即德国伊斯兰大会(German Islam Conference)。这一框架为双方的良好互动奠定了正式的制度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穆斯林移民还是德国民众，双方“已确定的期望”是相互融合，而不是分化、分裂和冲突，并且这种

① [美]J. M. 英格：《宗教的科学研究》(上册)，金泽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64—166 页。

② 同上书，第 171—174 页。

③ Götz Nordbruch, “Migration, Islam and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Hurriyet Babacan and Peter Herrmann, eds., *Nation State and Ethnic Diversity*,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 Inc., 2013, pp. 149-168.

④ Naika Foroutan, “Identity and (Muslim) Integration in Germany,” *The Report of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Washington, D. C.), p. 7, see [www.migrationpolicy.org](http://www.migrationpolicy.org), 2017-08-16.

“已确定的期望”并没有受到阻挠。显而易见,“社会功能模式”六个变项中的第二、六种情形,以及“社会冲突模式”四种情形中的第一、四种情形不符合德国的实际情况。与此相应,虽然很多的既有研究都表明,穆斯林移民在德国的社会融入存在很多困难,甚至是双方的互动还具有隔离式的特征,但穆斯林移民社会融入所带来的风险并没有给德国社会带来“革命性”的巨变,没有任何一方在主观上存在故意压迫另一方的情况,也不存在宗教冲突。因此,德国穆斯林移民的社会融入进程并不存在“社会功能模式”第四、五变项中提及的情形。最后,出于对德国流动穆斯林进行有针对性研究的考虑,本文还排除了“社会功能模式”中第一变项的情况,因为“多宗教的社会”是全球化时代绝大多数国家所共同存在的客观现实。

基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宗教身份与社会身份的互动是影响穆斯林移民在德国社会融入的主要原因。但是,现代社会中的每个人或群体存在甚至同时具有多重“社会身份”,如何从内涵和外延都极为丰富的“社会身份”概念中寻找一个载体以进一步揭示“宗教对穆斯林移民跨国社会融入的意义与作用呢”?从现实上看,德国穆斯林移民明确的社会期望是德国的公民身份,这是当前社会融入发生的“动力源”;而从学理上看,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首先是公民,这是其基本社会身份,而政治是个体以公民身份所从事的活动,其目标在于保障个体始终持有“人之为人”的条件,公民身份是沟通个体与政治的桥梁。<sup>①</sup>这意味着当穆斯林选择离开其母国,并成为客居国新移民的时候,穆斯林移民的跨国社会融入必然需要建立起对客居国公民身份的认同。另外,穆斯林宗教与社会生活密不可分的特点又决定其最主要的身份选择只能源于宗教认同,因此,与一般移民的跨国社会融入过程所不同,穆斯林移民不仅需要融入和适应以“公民身份”为主要特征的“现代”逻辑,还要回应其信仰层面上围绕“宗教认同”已经形成的“传统”逻辑。宗教对穆斯林移民跨国社会融入的作用与意义在于,宗教因素使穆斯林移民跨国社会融入面临着身份选择的“两难”,并使其处于两种“并行又交叉”的社会网络里,他们一方面需要适应公民身份为依托的认同体系,另一方面又需要在其中建构并维系以信仰符号为纽带的宗教身份。从社会融入的内涵上看,这种身份选择的“两难”将在社会系

<sup>①</sup> 郭忠华:《个体·公民·政治:现代政治的思想理路与悖谬趋势》,《浙江学刊》2007年第6期。

统的有序匹配与行为体的良性互动中同时存在。

## 二、穆斯林移民社会融入中的身份选择

穆斯林移民跨国社会融入的研究应注重从宗教分析的角度展开思考,这是由于穆斯林及其宗教信仰体系的特殊性所决定的,而在对“社会功能模式”与“社会冲突模式”的学理基础上,宗教身份与社会身份的互动是影响穆斯林移民在德国社会融入的主要原因。作为现代社会身份的基本载体,公民身份及其内涵体现了现代社会系统构建的基本原则和社会行为体行为的基本逻辑。宗教使穆斯林移民在跨国社会融入的过程中存在“以公民身份为主要特征的现代逻辑与围绕宗教认同已经形成的传统逻辑”之间相互交叠的情况,使穆斯林移民在跨国社会融入的过程中面临着身份选择的“可能”,并由此而产生了一些问题。

围绕“宗教认同与公民身份的互动”,身份选择会呈现出怎样的情形呢?按照本文对“移民社会融入”的界定,移民的社会融入包括:移民与社会系统的有序匹配,以及移民与社会行为体的良性互动两个向度。所以,从系统层面上看,国家是一个围绕公民权利与义务框架建立起来的集合体,具有更突出的政治与法律意义,公民身份是公民面对国家政权系统或统治组织所享有权利和所承担义务的载体,体现为“政治与法律意义上的公民身份”;而宗教认同是联结信徒与宗教组织的纽带,包含着信徒资格的获得,以及信徒在宗教组织中的宗教权利和义务的载体。从互动层面上看,在动态上国家是由若干个族群的整合与互构而成的,这些群体了解自己并给自己在由国家共同体组成的世界中确立了自己归属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讲,公民身份倾向于一种对文化归属感的描述,体现了文化和心理上的汇聚,是“文化与心理意义上的公民身份”;<sup>①</sup>而宗教认同则表现为信徒围绕宗教身份产生的归属感,也是信徒向其宗教信仰的价值、规范与面貌去模仿、内化并形成自己行为模式的表达,<sup>②</sup>也是一种心理和文化意义的反馈。

<sup>①</sup> 关于“政治-法律公民身份”,以及“文化-心理公民身份”概念的内涵可详细参见肖滨:《两种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双元结构》,《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76—83页。

<sup>②</sup> 梁丽萍:《中国人的宗教心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基于这样的认识,穆斯林移民要融入客居国,就意味着穆斯林移民的宗教认同体系要能够为客居国的政治-法律系统所接纳,同时,这一群体还需要与客居国内部的其他各方实现良性互动,并在文化-心理意义上建立起归属感。所以,围绕融入行为角色的主体与客体、融入行为态度的积极与消极进行交叉列表(参见图1)。在此基础上,宗教因素引发的身份选择“问题”可能造成穆斯林移民在客居国的社会融入出现四种情形(参见图2):第一种是“完全意愿合力式融入的情形”,即穆斯林移民主动融入且客居国积极的接纳;第二种是“主体半意愿主动式融入”,即穆斯林移民有主动融入的意愿,但客居国的接纳意愿相对被动;第三种是“客体半意愿推动式融入”,即穆斯林移民有相对被动的

		行为角色	
		融入主体 (S)	融入客体 (O)
行为 态度	积极融入 (PI)	SPI	OPI
	消极融入 (NI)	SNI	ONI

图1 社会融入的行为角色与行为态度交叉列表示意图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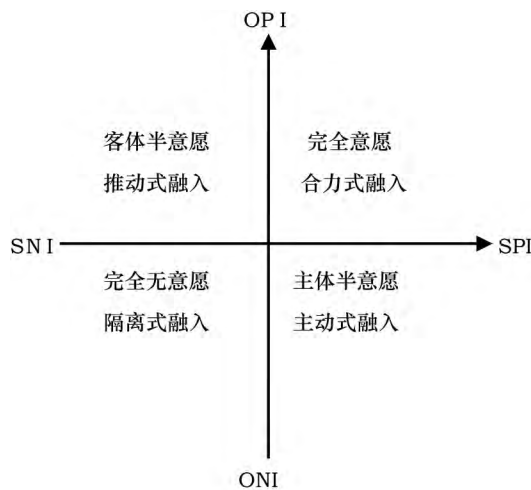


图2 穆斯林移民在客居国的社会融入的四种情形示意图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融入期望,客居国却有着较强的接纳意愿;<sup>①</sup>第四种是“意愿隔离式融入的情形”,即穆斯林移民既没有较强的融入意愿,且客居国在接纳穆斯林移民方面也比较消极。

具体而言,第一种情形应为穆斯林移民社会融入最为有效情形。在这种情况下,穆斯林移民由于母国的现实状况无法满足他们的某些需求,以至于他们产生投奔居住环境更佳、社会福利待遇更优越国家的向往,并且渴望能够真正成为该国的一员,与本土公民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保障,因此,他们融入客居国的意愿会很强烈;与此同时,由于发达国家大多面临人口老龄化,年龄比例失调,由此导致市场劳动力紧缺等问题,这些国家的政府往往出于本国利益的考量,在外来移民的融入进程中,有较强意愿扮演推动者角色,制定鼓励性的移民法律法规,对外来移民所享有的权利及所要履行的义务做出详细而明确规定,使移民在社会融入过程中更具保障。同时,为实现社会稳定,并促进移民更快地融入到主流社会当中,政府会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移民保留原国籍,并对可能形成的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持积极的态度。所以,在此情形下,穆斯林移民在客居国社会融入过程中的身份选择会表现为宗教认同与公民身份认同的相对均衡。

就“主体半意愿主动式融入”而言,穆斯林移民融入客居国社会的意愿更加强,他们渴望被客居国所接纳,想要成为永久居民或公民,进而获得与本土公民同等的社会权利,如就业平等、受教育权及同等的社会福利保障等。但作为融入客体的客居国政府,它们对移民融入到本国持消极态度,甚至通过限制性政策去应对移民的权利诉求。另外,穆斯林移民会更为主动地弱化其对母国文化和宗教体系的认同,并积极地在文化和心理层面建立对客居国的归属感,但客居国却对此反应消极。所以,在此情形下,穆斯林移民在客居国社会融入过程中的身份选择表现为公民身份认同比其宗教认同更显著。

就“客体半意愿推动式融入”而言,穆斯林移民对真正融入客居国社会并没有形成强烈意愿,他们或许只是出于生活和工作等方面的“需要”而选择短暂居住或停留。所以,对是否能够真正成为该国公民,获得同等的政治与法律

<sup>①</sup> 本文课题组成员曾就穆斯林移民的社会融入可能出现的三种不同情形展开过有针对性的梳理和研究,可参见封畅:《德国穆斯林移民的社会融入分析》,同济大学国际政治系硕士论文,2017年3月,第12—13页。

上的地位和权利,他们并不在意。但作为融入客体的客居国一方,出于本国利益的考量,比如为弥补严重的老龄化而带来的国内劳动力不足,对高技术人才的引进、对特定政治价值与道义关怀的支持等方面的需求,客居国政府会倾向于在移民的社会融入进程中采取积极政策与措施。但由于移民对获得公民权的愿望并不强烈,他们在心理上也更倾向于对其母国文化和宗教价值认同,对移居国的归属感较弱。在此情形下,穆斯林移民在客居国社会融入过程中的身份选择表现为宗教认同比其公民身份认同更显著。

第四种情形是穆斯林移民社会融入最不乐观的情况,在此情况下,穆斯林移民的社会融入并没有真正发生,或者是迫于其他力量影响而发生。总之,穆斯林移民与客居国两方均没有在政治与法律系统上尝试匹配,也不会为行为体间的良性互动而进行努力,所以,穆斯林移民的身份选择具有较强的对立感,宗教认同与公民身份的互动处于无法兼容的状态甚至对立。

综上所述,在跨国社会融入过程中,穆斯林移民四种身份选择对应表现为:公民身份认同比其宗教认同更显著,宗教认同比其公民身份认同更显著,宗教认同与公民身份认同相对均衡的特点,以及两者相互排斥和对立的情形。

### 三、德国穆斯林移民社会融入中身份选择概况

从时间上看,德国穆斯林移民社会融入及其身份选择的“问题”是从穆斯林移民成规模地进入德国时开始出现的,后伴随着三次移民浪潮,穆斯林移民在德国社会融入过程中的身份选择对应呈现出三种不同情形。

首先是穆斯林劳工式移民浪潮下的穆斯林移民在德国的社会融入情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西欧推出“欧洲复兴计划”,联邦德国(以下简称德国)经济得到快速恢复和发展,但由于战争中青壮年的伤亡和战争前后出生率下降,德国国内劳动力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德国政府推出从国际市场实行劳工招募国家政策,直到1973年石油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背景下,这项劳工招募政策才终结。<sup>①</sup>对此,一些穆斯林国家对德国的外籍劳工招募计划积极回应,

<sup>①</sup> Götz Nordbruch, "Migration, Islam and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pp. 149-168.

其目的是为了缓解国内越发严重的失业状况,以及通过劳务输出提高国家的外汇收入。有统计显示:1960年,德国境内大约有33万外国劳工,而到1964年这一数字已经增至100万,其中的穆斯林比例也由1%增长到11%,<sup>①</sup>1965年,仅土耳其的穆斯林劳工移民就有13.2万,而到1973年这一数字达到约91万。<sup>②</sup>在此背景下,从穆斯林移民的角度出发,他们来到德国成为劳工主要是迫于国内就业压力和对更好工作机会的渴望,但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和语言不通等原因,外来的穆斯林劳工只能从事较为低端的工作,并聚居在条件较差的贫民区,这使他们与德国主流社会的接触非常有限,但却使其自身“伊斯兰式的生活方式”得到较好保持。这意味着早期的穆斯林劳工并没有在德国实现真正意义上社会融入,更多的是以一种被动心态和姿态在德国进行工作和生活。与此情形不同的是,从作为客居国的德国角度来看,尽管有研究指出,在接纳外来穆斯林劳工的过程中,德国政府并未认真考虑过这些劳工移民最终会否定居下来的可能性,而且德国人所持有的观念是,他们是客籍工人,是外国人,一旦德国不再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自然会返回家乡。<sup>③</sup>但是,德国政府和社会对穆斯林劳工移民还是表达出相对积极的接纳态度,因为,以轮换制为特点的劳工招募政策本身主要是通过短期签证来保证外籍劳工的流动性,进而保证德国雇主在用工上有足够的灵活性,以适应生产需要,但这种灵活性也使德国雇主面临因员工流动性较大而带来更高的管理和培训成本。所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穆斯林劳工移民的居住许可证和工作许可证不断地获得延长,他们的宗教活动与生活方式也得到德国雇主的尊重和支持。<sup>④</sup>为此,在穆斯林劳工式移民阶段,穆斯林移民在德国的社会融入更多表现出“客体半意愿推动式融入”,而在其“伊斯兰式生活方式”的环境下,穆斯林移民的身份选择在宗教认同上要明显高于对公民身份的认同。

其次是穆斯林家庭团聚式移民浪潮下的穆斯林移民在德国的社会融入情形。在此阶段,德国经济发展的放缓压缩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使德国终止了

---

① Richard D. Alba, *Germans or Foreigners? Attitudes toward Ethnic Minorities in Post-reunification German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 76.

② Jonathan Laurence, "Islam and Identity in Germany," *Europe Report No.181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March 14, 2007, p. 4.

③ 邵继娜:《德国穆斯林移民族群及其社会融合问题研究》,山东大学社会学系硕士论文,2011年4月,第18页。

④ Götz Nordbruch, "Migration, Islam, and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pp. 151-153.

劳工招募政策,并开始推出鼓励国内外籍劳工返回自己国家的政策。而且,欧洲统一市场的建立对工人熟练度的要求提高也在客观上减少了外籍劳工在德国继续工作的机会。但德国政府也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推出“允许配偶和子女移民到德国实施家庭团聚”的政策。在此背景下,第一代劳工移民尽管与德国主流社会相对隔离,但他们也建立起以伊斯兰生活方式为代表的生活圈和社区,<sup>①</sup>长期在德国的工作和生活,以及德国优越条件也使他们更愿意继续留在德国,而对外来移民开始不断收紧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让移民留下来的愿望更强烈,渴望获得德国永居权或公民身份。与此同时,通过“家庭团聚”政策来到德国的穆斯林移民呈现快速增长,移民们对德国的政治与法律体系也表现出较强认同,尤其是在公民权及受教育权利方面,因为他们意识到德国的政治与法律体系是维护他们自身权益的前提。另外,从德国角度来看,虽然终止了外籍劳工招募计划,但终止计划的原因是该政策本身就是一项暂时性的国家计划,并不意味着德国对穆斯林移民积极的接纳态度有所改变。而且,德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实际上为穆斯林移民的社会融入进行了很大努力,“允许配偶和子女移民到德国实施家庭团聚”的政策本身就是一项重要尝试。随着穆斯林劳工移民及其家属移民在德国数量的不断增加,德国政府还采取有效的社会认同政策去应对社会中开始出现的融入问题,时任外国人事务专员海因茨·库恩在1978年的一份备忘录中首次提出移民融入政策的具体构想,<sup>②</sup>而处理移民事务的有关部门还草拟了有关促进移民融合的指导性报告,在这份官方报告中,德方表达了将通过多项措施以使得穆斯林客籍劳工拥有更多就业机会和权利保障的考虑。<sup>③</sup>所以,在穆斯林家庭团聚式移民阶段,穆斯林移民在德国的社会融入更多表现出“完全意愿合力式融入的情形”。

最后是避难式移民浪潮下的穆斯林移民在德国社会融入情形。苏东剧变及冷战结束导致一批批因生活或政治问题所迫的人们选择向德国迁移,在一些地区,特别是穆斯林聚居的国家和地区出现大批战争难民。<sup>④</sup>对此,很多欧洲国家实施带有政治色彩的“避难”政策,由于德国移民政策相对宽松,大量

① Theodore Karasik and Cheryl Benard, “Muslim Diasporas and Networks,” in Angel Rabasa, et al., eds., *The Muslim World After 9/11*, Santa Monica: Rand Cooperation, 2004, p. 441.

② 郑朗、伍慧萍:《新世纪德国移民融入政策及其理念分析》,第15页。

③ 封畅:《德国穆斯林移民的社会融入分析》,第20页。

④ Krim Yildiz, *The Kurds in Turkey: EU Accession and Human Rights*, p.16.

“政治避难者”和“人道主义难民”进入德国。<sup>①</sup>在此背景下,在这一阶段,无论是第一代的劳工移民及其家属,还是新进的移民都有较强融入德国主流社会的渴望,前者是长久居留的习惯性使然,而后者是出避难的考虑。为此,他们均强调要获得和当地德国人一样的权利和利益,并且都积极地通过教育、语言学习、自主创业、伊斯兰社团结社等方式表露出长久居住德国,获得合法公民身份的意愿和努力。<sup>②</sup>不同的是,第一代劳工移民及其家属由于主要生活在以“客工”身份纽带建立起来的伊斯兰聚居环境下,他们与德国主流社会联系较弱,这使他们在心理-文化归属上更倾向于其宗教认同而非德国公民身份的文化内涵。但是,第二、三代的穆斯林移民家属却对德国的公民身份具有更高认同,<sup>③</sup>这是因为这些年轻的穆斯林从小生长于德国,无论在政治-法律还是心理-文化归属层面,对德国的公民身份均有较高认同,同时,他们更意识到,要在德国获得更好的待遇和权利必须要用“德国的方式”生活。从德国角度来看,在经历了劳工招募和家属团聚移民阶段后,德方虽然对穆斯林劳工移民及其家属在德国面临的社会融入问题持否定的态度,<sup>④</sup>但有研究指出,随着移民带来的社会问题凸显,德国政府和各主要政党围绕避难法,进行了激烈争论,德国联邦议院于1993年7月以2/3的多数票通过新的《政治避难权法》,放弃了冷战时期形成的对来自于原社会主义国家的难民予以大量接纳的模式。<sup>⑤</sup>此外,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穆斯林移民自主成立的社会组织在德国逐渐兴起,这些最初带有宗教意义的“同乡会”逐渐成为穆斯林移民在德国争取权利的“代言人”,<sup>⑥</sup>但德国方面却为这些组织的社会活动和政治参与设置诸多非正式障碍,这是因为德国政府依旧视伊斯兰教为“外来宗教”或“移民宗教”,伊斯兰社群仍不是有30年以上历史的“稳定社群”。<sup>⑦</sup>为此,在穆斯林避难式移民阶

① 1993年前,德国基本法的第16条规定,“受到政治迫害的人享有政治避难的权利,并在等待申请结果时可以享受相对慷慨的社会福利”。为此,大多被拒绝的政治避难者还是滞留在德国。〔德〕沃尔夫冈·鲁茨欧:《德国政府与政治》(第7版),第400—403页。

② Steffen Angenendt, “Muslims, Integration, and Security in Europe,” pp. 48-50.

③ Sonja Haug habil, et al., “Muslim Life in Germany: A Study Conducted on Behalf of the German Conference on Islam Research,” in *Report 6 of Federal Office for Migration and Refugees (Germany)*, pp. 120-125, <http://www.npdata.be/Data/Godsdiens/Duitsland/fb6-muslimisches-leben-englisch.pdf>, 2017-07-29.

④ Götz Nordbruch, “Migration, Islam and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p. 153.

⑤ 宋全成:《简论德国移民的历史进程》,第91页。

⑥ Götz Nordbruch, “Migration, Islam and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pp. 159-160.

⑦ 胡雨:《穆斯林移民在德国及其社会融入》,第75页。

段,穆斯林移民在德国的社会融入更多表现出“主动意愿式融入的情形”,穆斯林移民的身份选择在公民身份的认同上更为突出。

综上所述,在客籍劳工式移民阶段,穆斯林移民在德国的社会融入属于“客体半意愿推动式”,具有相对强的宗教归属;在家庭团聚式移民阶段,穆斯林移民的社会融入表现为“完全意愿合力式融入”的情形,他们在宗教认同与公民身份的认同上显得相对均衡;在避难式移民阶段,随着德国政府开始收紧移民政策,穆斯林移民在德国的社会融入呈现出更多“主体半意愿主动式融入”的特征。

#### 四、德国穆斯林移民社会融入的身份选择

以上分析表明,就身份选择视角而言,三次移民浪潮及其引发的穆斯林移民在德国的社会融入呈现出了“客体半意愿推动式融入”——“完全意愿合力式融入”——“主体半意愿主动式融入”的演化规律。这意味着从穆斯林移民的角度上看,他们在德国的社会融入遵循着从“被动生存”——“有意融入”——“主动融入”的变化过程,由于宗教性在其伊斯兰生活方式中的核心地位,他们在身份选择上则表现出“强宗教认同”——“宗教认同与公民身份并重”——“强公民身份认同”的演变轨迹。另外,从作为客居国的德国来看,德国政府与社会对穆斯林移民的接纳呈现出“主动接纳”——“选择接纳”——“被动接纳”的演变轨迹,而且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公民身份体系和互动接纳条件的变化方面,即公民身份在政治-法律上的限制性条件不断增加,在心理-文化上的隔阂不断加强。究其本质,这一趋向特征主要是德国政府与社会受到特定时代国际互动与内在驱动双重作用的使然,具体表现为“经济的供需取向”——“道义的价值取向”——“政治的利益取向”的变化特点。

有研究指出,在科学的概念化过程中,具体现象被分成若干单位或部分,有待研究的概念体系最为显著特点通常在于它区分于其他单位的特性,但是,与物理学体系中的单位特性所不同,行动体系中单位的特性主要基于行动,这是因为,行动为这样的单位提供了“存在”的三方面依据,即行动者、行动目的、

行动处境。<sup>①</sup>这意味着行为者行为包含着行为者区别于他者最为重要的特征,因为行为是行为者行动逻辑的体现,是行动原因机制的集中表达。所以,穆斯林移民在德国社会融入的进程中,穆斯林移民和德国政府的行动轨迹和变化必然包含着其作为行为体在这一问题领域的特定逻辑。

从穆斯林移民社会融入行为来看,其行为轨迹呈现出宗教世俗化的趋向性特征,其实质在较大程度上体现了一种结果性逻辑。一般认为,“宗教世俗化”是当代宗教社会学理论体系中“由欧洲的启蒙理念和经验生发而来的、以经典社会学家们的某些论述为基础的、有关宗教在现代化进程中趋于衰落的各种观点”,<sup>②</sup>其核心内容主要是强调,在科学主义与物质主义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理性将逐渐取代宗教性成为现代社会运行的基石,所以,宗教对社会的重要性的影响式微,甚至有可能消亡。但是,“宗教的全球复兴”和“世界性非世俗化”的现实却表明,宗教性与现代性似乎并非是一种“零和”的关系,为此,新宗教世俗论者甚至将一些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宗教研究,将基于个体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原理用于宗教现象的理解和分析。无论这样的学理论争和演进过程存在哪些问题,这样的学理内涵表明宗教衰退并非宗教世俗化的唯一内容,它只意味着宗教传统意义上作用的消退,而不能视为是宗教失去了对社会的影响,相反,宗教还可能正在以某种新的方式发挥着对社会新作用。所以,从逻辑上看,宗教的世俗化包含的内在机理是将宗教行为视为理性人,在时代变迁或重大决策时,能够通过“成本-收益”的思路,将行为和目的相互关联。就穆斯林移民在德国的社会融入而言,作为融入主体,宗教世俗化的逻辑内涵表现为,在社会融入的过程中,穆斯林移民的宗教意识与其社会行为逐渐分离,在主观上,宗教意识不再是其社会行为的主要驱动,相比而言,现代国家观念及其与之相应的政治-法律意识开始发挥对其社会行为更显著的导向性作用;在客观上,宗教内容在其整体的社会生活中日趋边缘化,而以工具理性和物质主义为代表的现代生活开始成为其主流或追求的目标。在此背景下,为“服务于”穆斯林移民日趋增强的现代性需求,穆斯林移民的宗教性及其社会意义将会更多的通过“工具化”的方式表现出来。

从德国对穆斯林移民社会融入的接纳行为来看,尽管德国对穆斯林移民

① [美]T. 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48—49页。

② 汲喆:《如何超越经典世俗化理论?》,《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4期,第55页。



的接纳行为所表现出来的三次“行为取向”之间并未呈现出特定规律,但每一次的“接纳行为”都是德国受到不同时期国际互动与内在驱动双重作用的结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在其国家实践中形成的有意识与无意识的经验驱动而来的,所以,德国对穆斯林移民的接纳行为在较大程度上体现了一种实践性逻辑。对实践性逻辑而言,有研究认为,“实践是适当行动的实施……是具有社会意义的有规律行动,这类行动具有不同程度的适当性,同时包含并展现背景性知识和话语,并可能物化这样的知识和话语。……行动者的行动不是单纯的利益权衡使然,也不是单纯的规范思考使然,而是他们每时每日的实践活动使然……物质因素和理念因素都会发生作用,……没有实践,物质不能产生意义,理念也无法成为行动。”<sup>①</sup>显然,在穆斯林移民社会融入方面,一方面,德国的接纳行为本身就是与融入方互动实践过程的一个部分,因为接纳行为不仅受到作为“接纳方”自我实践经验的影响,而且需要兼顾“融入方”行为及其行为背后的有意识与无意识。如果说客籍劳工的移民政策始于经济复苏的物质性驱动,那么,延长居住许可证和工作许可证,以及推进家庭团聚的移民政策则更多是符合主流社会规范的道义使然。从“融入方与接纳方”的实践角度出发,“自我-他者”的互动实践为上述物质驱动和道义取向的结合并转化为行为提供了逻辑支持;另一方面,德国的接纳行为还体现着其作为行动单元在国际社会与国内情境中实践的影响。在国际市场招募并“主动”接纳劳工的行为是德国集中精力恢复国力的国内需求外化的体现,同时也是冷战背景下借助美国力量,应对苏联威胁的国际实践内化的结果。而在冷战后,德国对政治避难者的“被动”接纳行为不仅是德国国内要求限制移民诉求的外向化表达,也是德国在国际意识形态之争中“选边站”的内化选择。从“外部性与内部性”的实践角度出发,“外部性内化-内部性外化”的互动实践为德国在穆斯林移民的接纳行为的取向上由“经济取向”转向“政治取向”提供了逻辑内涵。为此,在穆斯林移民的社会融入进程中,德国方面的接纳行为并非是经过理性的判断和符合规范的设计,而是更多表现为对“自我-他者”“外部性内化-内部性外化”的互动实践及其实践经验的依靠。

综上所述,在难民危机的背景下,从德国国内情况看,三次穆斯林的移民

<sup>①</sup> 秦亚青:《行动的逻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转向”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第186—187页。

浪潮为德国带来的大批移民为德国经济发展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性的宗教问题、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居住区隔问题,以及二代和三代移民的福利分配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带来穆斯林社会融入的公共性问题,也对德国公民权相关的利益和福利分配构成了冲击。<sup>①</sup>从德国外部环境上看,近年来暴力恐怖事件的频繁发生,特别是叙利亚危机和巴黎恐怖袭击的发生,许多西方国家把出现的各种不安定因素都归咎于穆斯林移民身上,将他们视作为社会发展与稳定的“绊脚石”。<sup>②</sup>但随着国内穆斯林移民政治参与的增多和新生代穆斯林移民经济实力的增强,德国方面不得不对穆斯林移民的社会融入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基于这样的认识,作为“接纳方”的德国将会采取社会适应与社会控制并重的方式应对穆斯林移民在德国的社会融入,而从“融入方”出发,穆斯林移民将会更多的以其宗教性需求和关切作为与德国政府进行争取政治权利与社会福利的资本。显然,在即将到来的后难民危机时代里,穆斯林移民在德国的社会融入将会进入一个新的博弈过程,更重要的是,从宗教视角出发,这轮博弈背后存在着两种逻辑的互动,即穆斯林移民在德国的社会融入中,作为融入主体的穆斯林移民遵循工具理性为主要特征的结果性逻辑,而作为客居国的德国则更多的坚持主体间互动为基础的实践性逻辑。通过对穆斯林移民在德国社会融入进程的研究和逻辑的抽象,以进而为后难民危机时代德国穆斯林移民社会融入的新一轮博弈提供一个分析的参考正是本文撰写的另一个初衷。

---

<sup>①</sup> Stephen Castles, “Guest Workers in Europe: A Resurrection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40, No.4, 2006, pp. 741-766.

<sup>②</sup> Naika Foroutan, “Identity and (Muslim) Integration in Germany,” p. 10.

Social Integration of Muslim Immigrants in German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on between  
Religious Identity and Citizenship ..... *Liu Qian* (86)

In recent years,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Muslim immigrants in Germany has received a lot of attention. This issue touches up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us identity, which is a traditional social bond, and citizenship, which is a cornerstone of modern state. In this context, if Muslim immigrants attempt to integrate themselves into the German society, they have to make their religious identity receptive to the German politico-legal system. Meanwhile, they also need to maintain a positive interaction with the German society in order to realize feelings of attachment in the cultural-psychological sense. In terms of actor's role (subject-object) and behavioral attitude (active-passive), there are four scenario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Muslim immigrants in Germany: "both-active integration," "subject-active integration," "object-active integration," and "both-passive integrat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social integration, Muslim immigrants and Germany follow two types of logic, with the former exhibiting the tendency of religious secularization, and the latter relying more on its practical experiences of the "Self—Other"/"internalizing externalities—externalizing internalities" interaction.

**ARTICLES**

The Influence of Diaspora on Contemporary  
American Diplomacy ..... *Long Dexin* (104)

American diaspora diplomacy refers to one or a series of clear and systematic policy plans aimed at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development assistance and public diplomacy by means of the resources of diaspora and their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elations with the homeland. America has not yet established a highly formal approach to these policy plans, but diaspora diplomacy has been conducted mainly through institutionalized global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Through the Global Diaspora Forum, the African Diaspora Market,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aspora Engagement Alliance, American diaspora diplomacy exhibits different